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

——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 左冬梅^{a b} 李树苗^b

(西安交通大学 a.管理学院 b.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西安 710049)

摘要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劳动力迁移,社会性别,家庭养老,农村留守老人,福利

中图分类号 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1)02-0093-08

1 研究背景

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快速转型。几乎与此同时,政府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加之死亡率的降低,人口开始老龄化。2004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43亿,占总人口的10.97%^[1]。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量中青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未来农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将远高于城镇。根据比较保守的预测,2050年,农村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将比城镇高出约13个百分点^[2]。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刚刚起步,农村老年人主要是靠子女赡养和照料,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几乎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全部^[3]。然而,劳动力外流拉大了代际间的地理距离,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城市的现

代文化熏陶着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造成他们赡养父母的传统责任意识淡化。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和二元户籍制度的背景下,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福利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体现在家庭养老模式以及外出流动子女的养老支持行为的变化上?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是目前亟须深入研究的热点,其结果会对当前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多数的研究表明^[4-5],合作群体模型(Altruism/Corporate Group Model)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家庭目前的代际支持行为,利他性(Altruism)和交换(Exchange)行为同时存在于家庭的经济交换中。而在我国农村的特殊背景中,父母和子女间代际支持行为符合改进后的合作群体模式,家庭养老责任内化、血缘亲情及道德舆论的监督是子女为老人提供帮助的主要约束^[6]。此外,中国农村家庭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角色规定,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关系模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以及“养儿防老”这些俗语充分表达了儿子和女儿在养老责任方面的差别。但是由于劳动力外流带来

收稿日期 2010-12-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0803039)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IRT0855)

作者简介 左冬梅(1973-),女,新疆石河子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老年学。

女性就业率的增加,不仅减少了留守老年人的照料者资源,也提高了妇女的经济能力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能带来上述传统养老模式的转变,因此,社会性别是本文重要的理论视角。

相关的已有研究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现代化和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支持影响的研究,数据大多数都来自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调查^[7],而留守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多被作为代际支持的后果加以关注^[8],其中涉及到子女的信息也多是基于老年人的报告^[6];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农民工汇款、社会融合、观念变化等的调查和数据分析,直接和间接地反映子女外出对于农村留守老年人的福利影响^[9]。现有研究对于养老支持性别分工的变化及其对留守老年人福利的影响关注尚不充分。由于代际支持涉及到代际双方的行为,因此,分别利用来自老年人和子女单方面的数据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割裂和偏差。由于数据的局限性,目前仅有的一项研究同时采用来自老年父母和子女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老年人获得和提供给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进行了研究^[5]。

我们选取了典型的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作为调查地。根据2005年的统计结果,安徽省的跨省流出人口占全国的7.73%,居全国第三位,调查地巢湖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而广东省的跨省流入人口占全国的33.64%,居全国第一位^[10],因此,我们将安徽巢湖农村和广东省深圳市分别作为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进行调查。在安徽省巢湖地区组织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其对象是居住在巢湖市农村地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样本为乡、村两级分层多级抽样,一次基期调查和三次追踪调查分别在2001、2003、2006年和2009年开展,有效样本分别为1715人、1391人、1067人和807人。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被访留守老人的基本特征、社会经济状况、生理心理健康状况、观念、老人所有存活子女的状况及留守老人与子女间的代际支持状况。“深圳外来农民工抽样调查”对年龄在15周岁以上,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有效样本为1739人,于2005年4月开展。问卷除了个人基本信息、婚姻生育、社会网络等内容外,与养老有关的信息包括农民工自身及其配偶父母的年龄、居住安排、生活来源、劳动能力、代际支持和养老观念等。

2 劳动力外流下的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

由子女赡养和照料一直是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劳动力外流带来了子女经济收入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打破了家庭成员原有的代际支持供给和需求平衡,对代际合作与交换产生了深刻影响。

2.1 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的代际合作

基于巢湖农村的四次追踪调查数据所进行的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除了反映农村留守老人与其子女间的各项代际交换水平,还包括各项代际交换水平在外出和未外出子女之间,以及父亲/母亲间和儿子/女儿间的差异。

基于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数据所进行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除了反映农民工子女与其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间的经济交换水平,还包括经济交换水平在子女流动前后、以及未婚群体的儿子/女儿间和已婚群体的丈夫/妻子间的差异。

根据表1和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劳动力外流的大背景下,赡养老人仍是代际支持的核心内容。代际交换以自下而上(由子女向老年人)的流向为主(除了表2未婚子女流动前,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超过子女给予父母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以经济上的帮助最多,生活照料较少一些,而老年人对子女的代际支持则是生活上的帮助和照料相对多一些,而经济支持比较少。绝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得到了儿女或孙子女在经济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料,而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的人数比例和数目或频率相对较少。同时,老年人和子女情感交流水平较高。目前多数农村老年人家庭中都有多个子女,子女们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工合作,以满足老年人的各项需求。例如,从表1看老年人主要靠外出务工子女获得经济支持,主要靠未外出子女特别是未外出的儿子提供日常照料帮助,而表2的结果进一步证实,流动后的子女比流动前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利用巢湖数据的前期分析表明,社会经济条件和健康状况较差的老人获得了子女提供的更多的经济帮助和日常照料^[11]。社会经济和身体健康条件较好的老人会为子女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帮助,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健康状况的变差,代际支持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的特点变得更加明显^[12]。

2.2 代际互惠与交换

受到传统家族延绵的责任感驱使,留守老人也将子女的发展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为子女尽力提供

表1 农村留守老人与子女间代际支持状况的描述与比较

年份	老年父母			未外出务工子女提供/得到(M1)			外出务工子女提供/得到(M2)			t 检验(M1 vs.M2)	
	父亲	母亲	t 检验	儿子	女儿	t 检验	儿子	女儿	t 检验	儿子	女儿
老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对数值)	2001	2.56	2.67	**	1.90	1.76	**	2.05	2.30	**	*** ***
	2003	2.69	2.76	ns	1.98	1.96	ns	2.17	2.25	ns	*** ***
	2006	2.74	2.93	***	1.94	1.96	ns	2.18	2.10	ns	*** ns
	2009	2.78	2.94	*	1.97	2.06	*	2.26	2.31	ns	*** ***
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对数值)	2001	1.03	0.73	***	0.47	0.36	***	0.62	0.42	**	*** ns
	2003	0.90	0.71	*	0.39	0.29	***	0.71	0.55	ns	*** ***
	2006	0.45	0.28	**	0.14	0.06	***	0.35	0.16	**	*** ***
	2009	0.72	0.48	**	0.28	0.22	*	0.41	0.35	ns	** ***
老人获得的生活照料	2001	3.06	5.16	***	1.86	0.58	***	0.88	0.35	*	*** ns
	2003	2.47	6.13	***	1.93	0.69	***	0.61	0.40	ns	*** ns
	2006	1.73	5.21	***	1.71	0.45	***	0.63	0.02	**	*** *
	2009	3.04	5.57	***	2.53	0.73	***	0.62	0.24	**	*** **
老人提供的生活照料	2001	2.69	4.10	***	1.42	0.26	***	2.06	0.09	***	*** ns
	2003	3.72	5.52	***	2.10	0.34	***	2.29	0.34	***	ns ns
	2006	6.00	4.44	**	1.75	0.40	***	3.92	0.79	***	*** *
	2009	2.47	2.80	ns	1.94	0.43	***	2.70	0.54	***	** ns
情感支持	2001	7.23	7.27	ns	7.03	7.43	***	7.39	7.88	***	*** ***
	2003	7.35	7.46	ns	7.13	7.67	***	7.35	7.63	*	** ns
	2006	7.23	7.29	ns	7.05	7.45	***	7.22	7.87	***	* ***
	2009	7.32	7.32	ns	7.10	7.44	***	7.23	7.73	***	* ***

注:1.数据来源为“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2.该表中样本量按照2001、2003、2006、2009年的顺序分别为:老年父亲(808/644/515/393人),老年母亲(907/747/902/415人),未外出务工的儿子(2759/2320/1659/861人),未外出务工的女儿(2898/2345/1784/983人),外出务工的儿子(713/501/530/786人),外出务工的女儿(176/137/160/446人)。3.经济支持是指调查期前12个月内子女(包括子女的配偶)和老年人间现金、礼物、食品等物品交换的总价值,器械支持是指调查期前12个月内子女(包括其配偶和子女)和老年人间家务帮助以及个人生活起居照料交换的频率;情感支持指调查期前12个月内所有存活子女与老年父母间的平均感情亲密程度总和,得分取值范围为3~9分,得分越高表明代际关系的质量越高。4.***为P<0.001, **为P<0.01, *为P<0.05, ns为P≥0.05,统计差异不显著。

表2 农民工子女与留守老年父母之间经济支持状况的描述与比较

	子女给父母			父母给子女		
	提供支持的子女比例(%)		平均值(元)	提供支持的父母比例(%)		平均值(元)
	儿子(n=108)	女儿(n=153)				
未婚子女流动前(M1)	儿子(n=108)	32.5	823.6	68.5	1358.9	
	女儿(n=153)	21.4	378.1	80.9	1711.1	
	t 检验	*	***	*	*	
未婚子女流动后(M2)	儿子(n=53)	72.9	3400.2	21.2	335.8	
	女儿(n=91)	81.4	3291.3	18.6	303.5	
	t 检验	ns	ns	ns	ns	
t 检验(M1 vs M2)		***	***	***	***	
已婚子女流动前(M3)	丈夫父母(n=470)	73.4	1143.3	32.1	325.0	
	妻子父母(n=470)	67.3	773.0	34.4	401.1	
	t 检验	**	*	ns	ns	
已婚子女流动后(M4)	丈夫父母(n=881)	88.8	2325.1	19.8	456.9	
	妻子父母(n=872)	85.1	1508.6	20.5	273.6	
	t 检验	***	***	ns	**	
t 检验(M3 vs M4)		***	***	ns	*	

注:1.数据来源为2005年“深圳外来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为适应本文的研究目标,对调查数据进行了筛选,仅包括55岁及以上的父母和配偶父母及农民工子女样本。2.经济支持的定义同表1。3.***为P<0.001, **为P<0.01, *为P<0.05, ns为P≥0.05,统计差异不显著。

回报,留守老人和子女间存在着互惠互利的代际交换^[13]。事实上,子女的外出使得家庭成员间更加频繁地进行代际交换,以使家庭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表现在,一方面,子女外出促进了代际间的相互支持,深圳农民工子女的调查结果反映,大部分已婚的农民工子女都得到了老年父母照料留守孙子女的帮助,高达42%的老年父母(或配偶的老年父母)对农民工子女下一代的照顾在其成长过程占到“超过一半”或“几乎全部”。对巢湖数据的前期分析表明,外出务工的子女往往为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经济上的帮助,以此换取后者在家务、特别是孙子女照料上的帮助,这种情况下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得到了加强^[11]。

另一方面,子女外出也促进了子女一代兄弟姐妹间的交换。由于子女与老年人共同居住往往被视作对父母的付出和养老责任的承担,因此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其他非同住子女,而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对象主要是与其同住的子女及其孙子女^[11],由此,同住的子女有可能通过老人而获得其他子女的补偿,增进了子女间间接的经济交换。对巢湖数据的研究表明,这种“互惠”的家庭内交换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自评、降低抑郁^[13,14]。

3 劳动力外流对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

子女外出不仅影响着子女与农村留守老人的各类代际支持水平,而且使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更加细化,并进而对留守老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带来影响。

3.1 对代际支持及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

经济支持方面,子女外出后经济状况的改善提高了他们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深圳数据显示,流动后,未婚子女和已婚子女给老年父母提供经济资助的比例和额度都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见表1)。利用巢湖数据的分析表明,对于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的农村留守老人而言,子女的这种支持对他们非常重要,有利于他们的心理福利和健康自评^[14],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子女外出的负面影响^[8]。但我们的研究也同时表明,如果老年人得到过多的净经济支持也会造成他们的心理负担^[13]。

日常照料方面,劳动力外流降低了子女对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频率,如表1,未外出务工的儿子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最多,而外出儿子与之相比

较有大幅度降低,外出务工的女儿相比未外出的女儿也有降低,但显然儿子外出带来的降低效果更为突出。对巢湖数据的前期分析表明,子女对老年父母进行照料体现了子女对老人的关心,提高了老人的心理福利,但仅有子女家务方面的帮助(如打扫卫生、洗衣等)能改善老人主观生活质量,而生活起居方面的帮助(如帮助洗澡、穿衣等)却作用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后者更涉及老年人的隐私,使他们感到自己的衰老和无用^[15]。

情感支持方面,子女外出有助于进一步明确子女间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分工,降低了子女与父母之间及子女兄弟姐妹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另外由于子女外出务工会为老人带来荣耀感,从而使代际关系更加融洽。见表1,外出务工的子女对老人的情感支持最多,深圳的调查也发现,与初次流动前相比,79.4%的外出农民工更加愿意听父母向自己诉说心事与困难。但也有研究表明,这实际上隐含了留守老人对外出务工子女的谅解,子女外出在实际上减少了留守老人的情感交流对象,使留守老人的孤独感增强^[7]。

由于城市里的大多数外来农村人口仍然是农村户口,因此受到就业限制,更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16]。巢湖数据表明,相对于未外出的子女,老人为外出务工子女提供的孙子女照料更多,在深圳针对农民工的调查也支持这一结果。巢湖数据的前期研究发现,农民工的老年父母对留守农村孙子女的照料加重了他们的负担^[17]。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照料往往被视为留守老人对子女的额外帮助,而不是分内之责,所以提高了他们的家庭地位和重要性,不但换来了子女更多的经济回报,而且使得老年父母感到自己更有价值。巢湖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其他家庭类型中的老年人,隔代家庭中的留守老人心理状况更好^[8]。但如果子女不能给予老年父母期望中的高经济回报时,则会增加他们负面的心理体验^[13]。

3.2 对家庭性别分工及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

3.2.1 老年父母性别分工及其健康的影响

由于在青壮年时期教育和劳动参与程度上的劣势,农村老年女性的经济福利状况比老年男性差^[18],受此影响,她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均低于男性^[18,19],比男性老年人更依赖于家庭的支持。

总体看,子女外出虽然使得老年父母得到了更多的经济回报,但也减少了他们获得的生活照料,

尤其是加重了老年父母尤其是老年母亲的孙子女照料负担。正如表1结果所表明的,老年母亲提供的生活照料远远多于老年父亲。子女外出会导致老年母亲与子女在生活照料方面的代际交换明显比老年父亲多,这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16]。但是,相比于老年母亲,老年父亲却因子女外出在经济上的获益更多。从表3可以看出,外出子女给予老年父亲的经济支持多于老年母亲,老年母亲往往选择加强与外出子女的代际交换,以获得更多的补偿性支持,与孙子女隔代居住以及提供孙子女照料的老年父母中,母亲得到了子女更多的回报。

但同时,女性老人也比男性老人获得了更多的生活照料(见表1),儿子外出使得老年父亲接受的生活照料显著减少(见表3)。这可能是因为儿媳妇是老年人生活照料的主要提供者,当儿子外出后,老年父亲接受异性的儿媳妇照料不方便所至^[20]。我们的前期研究证明,男性老年人身体欠佳时得不到照料的比例大于女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对于得到的照料帮助更满意^[21]。

3.2.2 子女性别分工及对留守老人健康的影响

儿子仍然承担着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的主要责任,如表1结果,无论是未外出子女还是外出子女,儿子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和照料帮助都显著多于女儿,同时儿子所获得的父母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帮助也更多,而深圳调查结果同样证明(见表2),无论是未婚还是已婚、流动前还是流动后,大多数情况下,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儿子比例显著多于女儿,其金额也明显高于女儿,例如,已婚子女流动后,给予丈夫父母的经济支持量为2325.1元,远

超过给予妻子父母的经济支持量1508.6元。

同时,巢湖和深圳的数据均倾向于支持子女的外迁促使儿子和女儿在代际支持方面性别分工缩小的结论。首先,在经济支持方面,如表1,外出务工的女儿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显著多于未外出务工的儿子,并且返乡的女儿也比返乡的儿子更有可能增加给父母的经济支持^[23]。如表2,未婚子女流动前,不仅向父母提供经济资助的女儿比例小于儿子比例,而且金额方面也仅为儿子的约46%,流动以后,未婚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资助的女儿比例大大提高,高达81.4%,女儿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金额也提高到了流动前的近十倍,这两个指标与儿子相比均无显著差异。已婚的子女流动前给妻子父母的经济资助额仅为773.0元,流动后大幅提高到1508.6元。

其次,生活照料方面,巢湖数据表明,外出普遍降低了子女对老年父母生活照料增加的可能性,但由于儿子降低的幅度更大,因此造成儿子和女儿在为父母提供生活照料方面的差异在缩小。

另外,女儿在情感支持方面有着显著优势,如表1的巢湖数据显示,无论是未外出务工子女还是外出务工子女,在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方面,女儿始终高于儿子,外迁更会扩大儿子和女儿间的这种差异。深圳数据显示,未婚女性每周与父母联系一两次的比例达到62.2%,而男性是37.6%。对于已婚农民工,21.4%的丈夫流动后比流动前更愿意听本人父母诉说心事或困难,28.4%的丈夫流动后比流动前更愿意听妻子的父母诉说心事或困难,而17.9%的妻子流动后比流动前更愿意听本人父母诉说心事或困难,28.2%的妻子流动后比流动前更愿

表3 老年人得到代际支持影响的多水平模型估计值(N=983)

	经济支持		日常照料			
	子女→父亲	子女→母亲	子女→父亲	父亲→子女	子女→母亲	母亲→子女
外出儿子 无 有	0.277***	0.209***	-0.986*	-0.111	-0.336	-0.725*
外出女儿 无 有	0.285***	0.265***	0.322	-0.227	-0.148	-0.889**
孙子女照料	0.006	0.011*	0.089	0.117**	0.132*	0.208***
独居或与配偶同住						
居住安排 与子女或其配偶同住	0.036	0.020	1.027*	0.936**	2.418***	2.670***
与孙子女隔代居住	0.068	0.137*	-0.872*	-0.402	-0.482	-0.327

注:1.数据来源为安徽省巢湖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2001、2003、2006年追踪调查。

2.代际支持的定义同表1。3.根据文献[22]结果绘制。

意听丈夫的父母诉说心事或困难,说明夫妻双方流动后增强了对配偶父母的理解与关怀^①。

前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女儿在经济方面的支持和儿子在情感方面的支持能显著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且仅有儿子及其配偶的生活照料能显著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15]。由此可以推断,劳动力外流对子女性别分工的影响给留守老人的健康福利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4 讨论

未来劳动力外流的规模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中国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子女迁移对老年父母的影响更具特殊性。本文以巢湖农村和深圳作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典型流入地和流出地,将在这两个地方分别针对留守老年人和外来农民工所进行的有关养老代际支持的调查数据相结合进行分析。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从老年父母和子女两个视角更加全面地对劳动力外流对留守老年人福利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设计有助于分别了解劳动力迁移对于留守老年人和外出子女两代人造成的影响,克服了以往研究仅依靠老年人的报告所造成的子女信息方面可能的偏差。巢湖数据信息有利于比较一个家庭内部未外出子女和外出子女在代际支持方面的差异,而深圳数据便于更直接地比较子女流动前后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流对代际交换性别分工以及留守老人福利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内老年父母和儿子女儿间的差异上,而且也体现在已婚农民工子女与自己父母和配偶父母间代际交换的差异上,而这一点是仅仅使用农村调查数据所无法发现的。

劳动力外流所引起的家庭变化有以下三个方面:子女经济收入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子女养老观念的变化。前两类变化改变了子女对代际支持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而思想观念的变化则是对子女提供养老支持意愿的冲击。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流给农村老年人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双面影响。面对劳动力外流带来的冲击,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仍然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保存,但与此同时,老年人家庭成员也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

从对传统的固守看,本研究表明,迁移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主要依靠儿子的家庭养老模式。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在流动后给配偶父母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也就是说留在农村的老年父母从媳妇而不是女婿处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留守老人也仍然更多地为儿子提供帮助。对巢湖的前期研究表明,从心理后果上来看,给儿子而不是女儿提供代际生活照料和孙子女照料更会提高留守老人的心理福利^[24],而相较于女儿,儿子给予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也对留守老人的心理满意度作用更强^[15]。并且传统的父系文化仍然使得女性主要担任家庭照料的角色,老年女性仍然在家庭中处于更加弱势和被动的地位。此外,对传统的固守还体现在老年人面对当前社会变迁的观念的滞后。巢湖数据的前期分析表明,绝大部分的被访老年人同意“养儿防老”和“依靠子女”的传统养老观念^[25],并且传统的茎干家庭仍然更符合老年人的期待^[8]。

然而,总体来讲,当前农村家庭养老处在变革期。首先,和其他亚洲国家进行的研究发现一致,中国农村的代际交换不再表现为传统的子女对老年人单方面付出和牺牲的责任,而是表现为代际间时间-金钱的交换^[13]。留守老人通过为子女提供外出所需的费用和照顾孙子女为子女外出创造条件,这种行为带有长期策略性投资的意味,提高了留守老人自身的福利^[26]。劳动力外流使得留守老人更多地参与子女的家庭事务,如照料孙子女。如果留守老人和子女双方的付出不平衡,会损害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13]。其次,虽然家庭内的代际交换主要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进行,但父母与子女在代际关系中的地位并不对等,相比子女,老年父母处于弱势的处境。经济帮助以及生活起居照料在子女中的分摊,会降低老年父母的主观生活质量^[15]。前期的研究甚至表明,子女为隔代居住照顾其孙子女的老人多给予的经济帮助,可能并不足以补偿留守老人多付出的劳动,子女通过外出诱使留守老人为他们付出更多^[22]。而老年人尽可能自己解决所面对的困难,并在子女尽孝不到时给予宽容和谅解。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农村老年人自身的传统养老观念也在改变,开始趋向于维护自己的独立性,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表示愿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接受入住养老院养老^[25]。当然,如前所述,这种变革还表现在,由于农村女性外出打工提高了她们的收入和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女儿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在增强。

受制于实证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

①资料来源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课题组 2006 年的调研报告——《深圳农民工调查技术报告》。

局限,未能真正做到在同一个家庭内,同时从老人及其外出子女的角度进行研究。来自安徽巢湖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和来自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具有完全的对等性。由于这两次调查相互独立且目的不同,所调查的安徽的老年人并非是深圳外来务工人员的父母,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巢湖地区外出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而深圳的外来务工人员则来自全国各地;此外,两次调查对于一些指标的测量标准也有所不同,这都会直接影响到两个角度研究结论的一致性。

5 政策启示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在社会经济还比较薄弱的条件下迅速发生,并以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步伐加快为背景,农村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资源提供者和资源接受者的双重角色,通过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分工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养老责任,满足了他们和其他家庭成员各自的需求。但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农村老年人在没有固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生活风险和养老困难比城市老年人严重。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留守老人在经济、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力度,鼓励农村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同时,政府应以发展农村经济为手段,鼓励留守老人参与农副业生产劳动,增加其经济独立性,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

在目前农村老年人的传统养老观念仍然浓厚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有着社会养老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老年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可以自理,可以为家庭生活继续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料理家务、照看和教育第三代方面,这对减轻年轻一代的负担,全力投入工作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强化基于“孝”的社会文化建设,提高留守老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

农村劳动力外流提高了外出农村女性的经济能力和家庭地位,她们在家庭养老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的农村老年人在子女数量和居住距离上还拥有可以调配的资源和余地,但随着子女数量的减少,无男孩户比例也在增加,仅仅依靠儿子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变得不再现实。政府应以国家“关爱女孩行动”为途径,通过宣传和立法等手段保证儿子和女儿在赡养父母方面的平等责任和义务,消除农村在家庭财产继承和土地分配等方面

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政策及乡规民约,通过面向上门女婿和独女户、双女户的优惠政策提倡女儿养老的招赘婚姻模式。

老年女性在家庭中仍处于弱势地位,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上更依赖他人,不仅生理健康水平更差,而且更需要情感慰藉。子女外出打工对于她们的负面影响超过男性老年人。政府应制定面向女性老年人的扶助政策,鼓励女性老年人参与当地有偿的经济活动,加强其自我养老能力,同时应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服务机构(如幼儿园和养老院)的建设,减轻女性老年人的家务劳动负担。

中国政府在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为进城农民工提供服务等方面也在积极探索。这种趋势,加上子女数特别是儿子数的减少,会给家庭养老造成重大的影响。政府仍然强调农村养老以家庭保障为主并不现实。应该抓紧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现代化和人口迁移还将在未来给农村老年人生活带来进一步的影响。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社会在人口结构、土地政策、农民工政策、社保制度等方面还将发生巨大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新进入老年的农村人口在经济能力、职业分化、观念等方面的自身差异也要比目前的老年人大,他们的养老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以重视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EB/OL]. <http://news.163.com/06/0223/20/2AM11RV00001124L.html>
- [2] 曾毅. 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J]. 经济学, 2005, 4(4): 1043-1066.
- [3] SHENG X, SETTLES B H.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Elderly Care in China: A Global Perspective [J]. Current Sociology, 2006, 54(2): 293-313.
- [4] LEE Y J, XIAO Z. Children's Support for Elderly Paren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1998, 13(1): 39-62.
- [5] SUN R. 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J].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3): 337-359.
- [6] 张文娟.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D].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2004.
- [7] 杜鹏, 丁志宏, 李全棉, 等.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J]. 人口研究, 2004(6): 44-52.
- [8] SILVERSTEIN M, CONG Z, 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2006, 61B(5): S256-S266.

[9] 李强. 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1(4): 46-67.

[10] 段成荣, 杨舸. 中国流动人口状况——基于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25(4): 5-9.

[11] 张文娟, 李树茁.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 [J]. *中国软科学*, 2004(8): 34-39.

[12] 宋璐. 劳动力外流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D].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 2008.

[13] CONG Z,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 [J].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 5(1): 6-25.

[14] 宋璐, 李树茁, 张文娟. 中国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对健康自评的影响研究[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6, 26(11): 1453-1455.

[15] 张文娟, 李树茁. 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 2005, 29(5): 73-80.

[16] 孙立平. 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M]/李培林. 农民工: 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 149-171.

[17] 左冬梅, 吴正. 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J]. *人口研究*, 2011, 35(1): 53-64.

[18] RUDKIN L. Gende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of Java[J]. *Demography*, 1993, 30(2): 209-226.

[19] 宋璐, 李树茁. 代际交换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基于性别差异的纵向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06(4): 14-20.

[20] 黄何明雄, 周厚萍, 龚淑媚. 老年父母家庭照顾中的性别研究概观——以香港的个案研究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3(1): 60-70.

[21] ZHANG W, LI S, FELDMAN M W. Gender Differences in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Chaohu [J]. *Journal of Women & Aging*, 2005, 17(3): 73-89.

[22] 宋璐, 李树茁. 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分工的影响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8(3): 10-21.

[23] 宋璐, 李树茁.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J]. *人口学刊*, 2008(3): 38-43.

[24] 宋璐, 李树茁, 李亮. 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08(3): 10-18.

[25] 左冬梅, 宋璐, 李树茁.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1): 24-31.

[26] SILVERSTEIN M, CONG Z, 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between Older People and Their Migrant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Strategic Investments, Strategic Returns[C]. The 2007 Annual Meeting of the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2007.

Abstract ID : 1672-6162(2011)02-0079-EA

Abstract :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community-management-based informal finance in rural areas and then explores the role of rural informal financ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changes of the number and amounts of loans in Z village from 2006 to 2009. It is found that in Z village farmers rely more on informal than on formal finance; community-management-based informal finance in rural areas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Z village, and it has replaced private loans and become the leading pattern of informal finance. At the micro-level, community-management-based informal finance in rural areas shows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China's rural financial reform and should be the main supplier in rural finance.

Key Words : Rural Finance; Community Management; Informal Finance

**(9) Study on Land Ticket Pattern and the Transfer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s: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DUAN Lizhi, FU Hongyuan · 86 ·

(Colleg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Real Estat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11)02-0086-EA

Abstract : To explore deeply the reform of the transfer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s, the land ticket pattern is put forward innovatively in Chongqing city. Firstly,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bout the reclam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s, the overall management of cultivated lands, the exchange of quota allocation, farmers' compensation and allowance, new residential area construction, and land ticket circulation and trans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sitive effects have been obtained such as the intensive use of rural lands, the improvement of patterns of connective lands use, the new mode of farmland protection, the activation of rural lands value,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rural resources and elements,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th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speedup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tc. Finally, such discussions as how to establish farmer's main status in land reclamation, how to integrate overall exchanged quota, how to improve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of land ticket have been given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provide China's rural collective lands reform with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

Key Words :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Land Ticket; Rural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s; Chongqing

(10)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Healthy Well-being of Elderly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Studies Based on Surveys in Inflow and Outflow Places**

ZUO Dongmei^{1,2}, LI Shuzuo¹ · 93 ·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ID : 1672-6162(2011)02-0093-EA

Abstract : The mass outflow of rural labor has not only accelerated the aging process in rural China but also has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household-dominated car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based on the longitudinal data from a three-stage sample survey: "The wellbeing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Anhui Province" conducted in Chaohu, and the data from a sample survey: "Rural-urban migrants in Shenzhen" conduc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he outflow of rural labor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The study focuses on both the inflow and outflow region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emphasizes a gender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elder care in rural China features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change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The outflow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brought dual effect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remaining in rural areas. By working away from home, migrant children are able to provide their parents with better economic support but less care and emotional support. This also places additional burdens on their parents in terms of childcare and agricultural fieldwork, thus affecting their health and well-being. With the migrant children working in the cities, the traditional filial culture is ebbing while the daughters' ability to support their parents increases.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under long-term low fertility has altere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household elder care that relies on support from male children. The paper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rural elders in the face of continued rural-urban migration.

Key Words : Labor Migration; Gender; Family Elder Support; Elderly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Well-being